



第七期

政协大连市中山区委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三月一日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华商

代表人物郭精义

方向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大连居民，不是经商就是做工，民族工商界的头面人物，要推郭精义为中心代表。他是日伪时期东大连（今中山区）华商公议会的首任会长，也是日本统治者在工商界的代理人，但对当时和以后大连地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郭精义又名学纯，1876年生于大连市郊之付家庄，第一贫寒。郭精义很孝顺母亲，又能刻苦自学，热心为乡亲邻里办事，曾获得前清候选同知。长期在家耕读度日。后来生计越来越困难，不

~1~

得不弃儒从商。开始他在金州城内永成庆号站柜台，由于知识丰富、办事有方，受到当时工商界知名人士庞义堂（泉水屯人）、周文礼（老虎滩人）等人的赏识，得到提拔重用。1896年（清光绪廿二年），庞、周等人集资在柳树屯（今大连湾）开设福顺成杂货店，并礼聘郭精义为经理。从此，郭精义在大连民族工商业中，开始崭露头角。

郭精义在柳树屯经商期间，可谓多事之秋，历尽艰辛。柳树屯本是地处偏僻之荒凉渔村，但是却被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看中了，认为柳树屯地形十分险要，是一块军事要地，是东北、辽南地区之海防门户，决定在这里驻重兵、建军港。1891年柳树屯因驻有大量军队，所以商业也随之勃兴。但好景不长，1894年黄海中日大战暴发，1895年辽东半岛沦陷，1896年经俄、德、法三国干涉，日军被迫撤离大连。经过战乱，柳树屯原来之商业繁荣局面，已被摧残得十分萧条。郭在这段时间的商业活动，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1898年，沙俄统治大连地区后，柳树屯的商业又开始恢复和发展，郭精义开设的福顺成变为沙俄方面购买羊草（马饲料），但获利很少，加上资金周转不灵，商店几乎收歇，后经大财东周广礼借银元宝三大锭，并专营杂货，才使郭精义的商业生涯逐步走向顺境，除还清债务外，还积累了不少资金。

郭精义经商得手后，又热心社会公益事业。1904年日俄战争时，大连地区成为中心战场，当时人心惶惶，社会秩序混乱，盗贼乘机活动，商民无法安心营业。这时，华商工商界组织——大连公议会协理刘肇亿负责组织商团巡丁，日夜守护街市、保护居民之生命财产。郭精义当时在公议会尚无一席之地，而他不为名利，挺身而出不分昼夜帮助刘肇亿领导商团，维持商民利益和社会秩序。从此，郭精义在工商界颇受拥戴。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寇将大连开辟为自由贸易港。距离柳树屯很近的青泥洼，本是荒凉渔村，此时已成为大连市区的中心地带，商业繁华程度已远远超过柳树屯。1905年年末郭精义把福顺成从柳树屯迁至大连市内，并把他个人历年来所得利润，全部投资于福顺成，一跃而为福顺成之大股东。1906年又在市区增设福顺成分号——福顺东杂货店。郭精义凭自己的经营能力，在一年之间即获大利。

日寇侵占大连初期，原大连公议会负责人张德禄逃跑，协理刘肇亿因有通俄嫌疑，被日本殖民当局扣押，经郭精义联合商民向日本殖民当局陈情担保，才得获释。1905年大连公议会改组时，郭精义声望已很高，被当选为公议会协理。从此，郭精义在商界中一帆风顺、青云直上。

1908年，大连公议会刘肇亿与协理郭精义发起成立规模庞

大的慈善机构——大连宏济善堂，基金来自宏济彩票局发行之彩票的盈利。该彩票每月发行一次，每次五、六万张，每张一元，计五、六万元，除支付中奖费用外，盈余甚丰。宏济善堂购买房屋数百余间，以房租收入用之于为广大贫民年老病死及各种救济善举。每年按季向贫农施粥和发放棉衣，平日施医给药，为广大贫农做了不少好事。

由于郭精义在工商界中深受众望，故日本殖民当局在1909年委任为敌伪民政署参事，伪大连公举堂公议员。1913年被任命为大连卫生组合付组合长，同年大连交易所成立，他又被任为商议员，商议员担负交易所的最高咨询和决策。在十名商议员中，郭精义为唯一之中国人，在被孤立和歧视下，仍能始终坚持华商的利益和立场，与企图操纵和把持交易所之日籍人员周旋。郭精义还兼任大连交易所信托株式会社的取缔役（董事）和民办龙口、辽东两银行的取缔役。

1914年，大连公议会改名为华商公议会，以示区别于日商。殖民当局虽然不高兴，但又无理由阻止。在这期间，因兼任慈善机构负责人的刘肇亿公私不分，挪用公款为自营企业做周转资金而引起社会不满，不得不辞去公议会总理和慈善堂总理职务。同年郭精义被选为公议会总理和慈善堂总理。

郭接任总理以后，对会务锐意革新，并与全国各地沟通商情，

~ ~ ~

从而祖国内地及沿海口岸之工商界亦一致称誉他为工商界之优秀领导。因此中华民国政府中央农商部特委任其为咨议。

郭式接任宏济善堂总理后，尽力增加了慈善救济经费，为广大受苦市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1915年，日本殖民当局撤消了宏济彩票的发行许可，使宏济善堂受到严重的经济影响。但是，郭精义有效地使用了宏济善堂原有之基金，加上他在社会上的声誉威望，使各个方面对宏济善堂给予大量捐助，宏济善堂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917年郭精义为了适应东北客商来连贸易的需要，特将福顺东杂货店增资扩大改名为福顺栈代理店，专门经营进出口杂货并代理各地来连商户之客事，做到水陆兼收，随到随办，保证客户满意。因此，各方客商对福顺栈的经营作风寄予高度信任和较好的评价，郭精义也从中结交了各地大批商户。此时郭精义已年过四十，经商阅历日渐丰富。他个人的经济实力也迅速增强，一跃成为日伪统治时期财产殷实、资金雄厚的新八大家之一，在华商工商界中居于领袖地位。大连商界，因地理环境和商民来自四面八方，所以分为四大帮派，即山东帮、关内帮、南方帮、本地帮，其中以刘仲亿为首的山东帮人多势众。自郭精义领导华商公议会后，已成为本地帮（又称金州帮）之领袖。此时郭精义在声望和地位上都超过刘仲亿，因而本地帮在工商界中居于优势。

自1907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从未来侵华战争考虑，把大连作为掠夺我国东北丰富资源的运转中心，鼓励华商购进大豆，并开设油坊。为此，日本殖民统治阶层对油坊业主给予原料托运、资金来源、税收等各方面一系列优惠政策，使大连地区油坊业发展迅速。郭精义也在这方面迅速做出反映，不失时机地把福顺成杂货店改为福顺厚油坊，并投资十八万元（银洋）。福顺厚开业后，先是采用石碾等陈旧设备生产，日产豆饼八百片，后逐渐改为机器操作，日产突破三千片左右。油坊生产几年来获利二百万元（银洋），使郭精义成为资金充沛，实力雄厚之大连市百万富翁。郭精义等华商开办油坊业之发展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打下了物质基础。

随着郭精义社会声誉日盛，誉之者甚多，认为他二系日派的也不少。郭精义坦然地说：“我处此环境，凡事尽力而为，其他在所不计也。”

1931年一切政治大风暴袭击大连工商界时，给了郭精义一个严峻的考验机会。日寇侵占大连后，为了逐步推行其“大陆政策”，加速对我东北经济掠夺。在金融方面妄图控制满蒙币制，筹划发行一种名义上是“金本位”，实质上是永不兑现的货币，名曰“金建制”。经过长期准备，终于在1921年4月14日由日伪关州厅长官山县伊三郎发布了“金建令”。命令关东州所属地方限期在本年内一律取消华商工商界实行的以“银本位”为主的“银建制”，

并规定在同年10月14日以后，大连市交易所（又名取引所）所属钱钞、特产、物品等交易市场，凡进行定期、现货交易者一律改用“金本位”之货币（朝鲜银行卷）。此项命令发布后，工商界群情大哗，认为这是对华商毁灭性的打击。此时此际的郭精义，身兼华商公议会的总理，是站在日本殖民者一边拥护“金建”，还是坚持维护全体华商利益，两者之间如何选择，对郭精义来说是一场严峻的政治考验，需要做出决断。郭精义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最大风险与牺牲，尽最大努力抵制了“金建”之推行。

郭精义在“金制”命令发布之日当天下午，召开华商紧急会议，商讨对“金建”问题的对策。会上群情激昂，一致要求坚决反对“金建”。郭精义几经考虑，毅然决定以华商公议会总理身份和他特有的“胆子要大、外事要细”的作风，一面组织华商请愿，一面以大连交易所为突破口，组织“不买、不卖同盟”实行罢市。日方一再威胁利诱，逼迫郭式站在统治者立场，为殖民当局服务，郭精义置之不理，反而进一步组织大连华商反对“金建”赴日请愿代表团，自任团长。赴日请愿之前，他向大连工商界表示：“此次去日本，一定把反对‘金建制’斗争进行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日本东京滞留的四十余天时间里，他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多次向日本政府陈述维护“银建制”的理由，但合理而正当的要求，始终没有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的答复，弄得代表团成员忧心如焚，愤不

成眠。经反复研究，认为日本政府既然要采取拖延政策，再留日本东京实无必要，不如回国后进行长期斗争、积极行动，以迫使日方放弃“金建制”。

郭精义一行回国后，“金建制”风潮依然未息，日伪方面对郭精义则进一步软硬兼施，企图迫使郭精义就范，结果华商公理会协理李子明被驱逐出境，又拘留敢于抗争之资本家，以此来威胁郭精义，郭不为所动。当大连地区“金建制”风潮旷日持久不得解决的消息传开后，引起祖国内地的一致声援，使大连商民倍感亲切和振奋，要求殖民当局收回“金建制”的斗争进入高潮。

1923年9月，日本政府内阁更迭，大连殖民当局首脑易人。新来之敌酋为安抚人心、缓和矛盾，采取折中办法，下令“金建、银建制”并用，才使这场风波暂告平息。

郭精义为了反对“金建制”，两年来奔走呼号，身心劳瘁，怒火中烧，于1923年1月患急性牙炎医治无效病故，终年48岁。治丧期间，全市商民十分悲痛，有的商民停业以表哀思。当时社会上谣传，郭氏在治牙疾时，日方医生用毒针刺入牙龈致死。此事虽无确证，但也说明日伪方面对郭氏的怀恨之心。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特颁给郭精义家属匾额一方，题词是“义声载道”，以表彰郭精义的爱国精神。